

# 越南的改革趨向

金榮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壹、前言

越戰於一九七五年四月結束後，越南立即成爲中南半島的軍事超強，它的一百二十餘萬兵力，僅次於中共、蘇聯、美國而居於全球第四位。<sup>①</sup>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越南揮軍入柬，擊潰波布政府並建立橫山林傀儡政權，再加上駐在寮國的數萬兵力，一個以越南爲首的「印度支那聯邦」已然成形。<sup>②</sup>中共爲了阻止越南在中南半島的霸業，一方面於次年二月進兵「教訓」越南，緩和波布政權所受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則透過泰國援助波布政權在泰柬邊區打游擊戰，於是越南從此逐漸陷入另一個「越戰」中而難以脫身。

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越南共黨政府所實施的集體經濟面臨極大的困境，一般老百姓所遭受的貧困、不平等和共黨政府剛成立時所承諾的和平與繁榮恰成諷刺的對比。<sup>③</sup>因此在黨裏面要求改革的呼聲愈來愈大，以阮文靈爲首的改革派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底掌權而展開一連串的改革。這次改革的前因後果如何？改革成功的希望有多大？改革對於越南共黨政府及其他鄰近國家的影響爲何？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

※ 本文爲筆者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做之學術報告，並依照在場學者意見做適度修改，謹在此對中研院社科所出席之研究人員致謝。

註① 一九八九年，越南的三軍總兵力爲一百二十五萬二千人，其中包括一百一十萬陸軍，三萬三千海軍及海防部隊，一萬二千空軍，以及十萬防空部隊。詳細兵力及裝備參閱：ASIA 1989 Yearbook, (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0 [hereafter FEER]), p. 250.

註② 越南駐在寮國的兵力，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估計約五個師，人數在四萬到五萬之間，寮國的共黨政府以越南駐軍來協助抗拒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參閱 McCloud, Donald G., *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6), pp. 226-231.

註③ 越南政府於一九七六年時，承諾十年內要給每一個家庭電冰箱、收音機、及電視，已無法兌現，和中共、柬埔寨的戰爭亦使得和平遙不可及。參閱 Porter, Gareth, "The Politics of Renovation" in Vietn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Tokyo, May-June 1990), p. 72.

## 貳、越戰結束後至侵柬前的政經情勢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越南共產黨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統一實施共產主義的北部越南和實施資本主義的南部越南。一名新加坡學者康袁金 (Khanh, Huynh Kim) 說明越南在統一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在北方，所需要的是恢復在戰爭中所損毀的硬體建設，然後依據可接受的原則、程序及組織來加以發展。這和南方的處理方式不同。在南方，所需要的是一個新的政策，此政策是建立在舊有社會政治體制的遺骸上，而此體制的理念和行為模式和新革命是完全不同的。」<sup>④</sup> 質言之，越南共產黨所考慮的是以何種速度將南部越南從資本主義轉變成為社會主義。

開始時，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採取頗為謹慎的態度來對付此一問題，這是因為越南政府需要南越的經濟力量以支援被戰火所摧毀的北部越南。越共總書記黎筭 (Le Duan)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宣佈說：「南部越南將是一個民主政權，擁有繁榮和民主的經濟；而北部越南則需往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sup>⑤</sup> 連越共中的共產理論家，前總書記長征 (Truong Chinh) 也支持此一漸進的路線，他說明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如何去異求同：「……在此過程中，南部必須將它的私有經濟逐漸向國家的利益靠攏，然後再將這些私有工、商、農、貿等企業沿著社會主義路線走向公營和集體經營或走向公私合營的道路。」<sup>⑥</sup>

在此種謹慎的政策引導下，越南政府逐步實施公私合營的工業，集體經營的農業和手工業，以及公營的行銷系統。<sup>⑦</sup> 為了解決耕地不足及都市人口高失業率二大問題，越南政府採取二項政策：鼓勵那些因戰爭而離開家園的農民回到原住地；以及設立新經濟區以疏散城市中的失業人口。剛開始時都避免採取強迫性的方式。<sup>⑧</sup>

註④ 原文出自 Khanh, Huynh Kim, "Year One of Postcolonial Vietnam,"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77*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7), p. 294. 本文則引自 Tan, Teng Lang,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 11.

註⑤ 越南勞動黨為越南共產黨的前身，勞動黨於一九七六年七月全越正式統一後改名為共產黨。黎筭的話引自 Tan,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p. 12.

註⑥ *Ibid.*

註⑦ 詳細資料請參閱 Beresford Melanie, *Vietna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88), pp. 62-65.

註⑧ 參閱 Tan,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p. 13.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採取穩健路線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能獲得國際上的援助。<sup>⑨</sup>以一個被戰爭所破壞殆盡的越南經濟言，外援是生存的最大憑藉。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是最大的援助者；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蘇聯答應援助包括一座建在黑河（Black River）的水力發電廠在內的四十項工業計畫。東歐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也提供不少援助，唯有中共不願意對越南提供經援，這顯然是戰略上的考慮。<sup>⑩</sup>

另一方面，在吸引西方國家的援助方面，成效並不太顯著。河內成功的和日本、法國、瑞典簽訂援助和貿易協定。可是對美國卻是失敗的，原來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三年的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簽訂後，所承諾的三十二億五千萬美元的援助因西貢淪陷而取消了，這對越南經濟的恢復是一很大的打擊。<sup>⑪</sup>

許多因素促成了越共領導人採取加速統一南北越南的政策。首先是以溫和手段疏散城市居民到新經濟區之政策的失敗。由於許多新經濟區沒有事先規劃公共設施，被放到那裏的城市人沒法忍受惡劣的環境而又逃回城市，變成了黑戶，並沒法減輕都市人口和失業的問題。<sup>⑫</sup>

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由於南北越制度上的差異，以致於以北越人爲主的越共領導人深恐無法控制南部越南。<sup>⑬</sup>對長期在戰火及貧困中生活的北越共產黨員而言，南越人那種久經資本主義所「腐化」的生活方式是「不具生產性和具有分離主義的潛在威脅性。」<sup>⑭</sup>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大多數越南人民對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混淆」，這一點令共黨領導人自「解放」南越後，一直憂心忡忡並圖謀改變。在共產主義理論中，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在越南，共產黨在自胡志明領導反抗法國以及美國扶植的南越政權以來，一直以民族主義爲號召。這個策略非常成功地拉攏了大多數越南人民組成「聯合戰線」來對抗帝國

註⑨ Kim, Ninh, "In the Era of Renovation: Leadership and Security in Vietna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Vol. 11, No. 2, Sept. 1989, p. 214.

註⑩ Duiker, William J., *Vietnam Since the Fall of Saigon*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26. 越戰結束後，中共明顯的把經援當成誘導越南改變對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參閱註⑫。

註⑪ 同前註，頁二六。美福特總統繼尼克森之任後，拒絕提供經援。卡特上任，雙方原有可能提供經援，一九七八年九月，越南副外交部長阮基石（Nguyen Co Thach）訪美和美官員討論經援事，惟美方已決定和中共建交，故因中共反對而不願提供經援。見前註，頁四九。

註⑫ Duiker, William J., *Vietnam: Nation in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3), pp. 107-108.

註⑬ Kim, Ninh, "In the Era of Renovation: Leadership and Security in Vietna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1, No. 2, Sept. 1989, p. 214. 越共總書記黎筭是南越人，這也是黎筭在統一的方式上採穩健態度的原因之一，唯政治局中大多數人爲北越人。

註⑭ 同註⑬，頁二一四。

主義，然而在擊敗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之後，越共卻發覺大多數老百姓還是如此的「不前進」，因此有必要推行階級鬭爭的觀念和行動。<sup>⑮</sup>

阮隆 (Nguyen Long) 描寫越共於一九七五年夏季在西貢試圖運用街頭公審卻失敗的例子。一名偷腳踏車的男子被共產黨員強迫跪在街頭，有千名左右的路人圍觀，而十餘名持槍的黨員則散佈在人羣中。共產黨員指控那名偷車賊代表美帝和其傀儡如何破壞人民的財產，其中數次此黨員伸手高呼「打倒美國和其走狗」的口號，可是在人羣中只有極少數人呼應，而大多數人只是在旁靜觀。到最後，那名黨員看並沒有激起民衆的熱潮，只有問那名受害婦人的意見如何，那婦人答說：「我要革命者原諒此人，此人因太窮才偷我的車。」那些黨員聽此話後，迫於形勢宣佈解除此偷車賊之罪而將他帶到附近的辦公室。<sup>⑯</sup>

越南共產黨內部因此對於採取何種步驟展開激辯，總書記黎筭以及他的部屬力主採取穩健緩慢的路線，達成南北二地的正式統一；另一方面，以共黨理論家長征爲首的另一批人則改口宣稱南北二地的統一須在最短的時間內達成，最後雙方在一九七五年底取得共識，在短期內達成統一。<sup>⑰</sup>除了前面所述種種因素使得越共領導人改變做法外，美國政府在聯合國否決南越臨時政府 (Provisional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South Vietnam) 的會員申請以及中越共關係的逐漸緊張也促使越共決定儘早統一以應付外交上的問題。<sup>⑱</sup>於是南北越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正式宣佈統一。

南北越正式統一後越南面臨最大的困難來自經濟方面。經過長期的戰亂，整個越南的經濟處於幾近崩潰的狀態，外國援助一直是維繫南北越經濟的最大支柱。是以越南在統一後即實施五年計畫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1976-1980)，企圖達成經濟發展和經濟社會主義化二大目標。<sup>⑲</sup>在此計畫中，農業方面要從原來的私有制加速變成集體公有制，而工商企業方面也由私有的改變成國有企業，這些都在一九七七～七八年間實施。<sup>⑳</sup>

註⑮ Nguyen, Long, and Harry H. Kendall, *After Saigon Fell: Daily Life Under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3.

註⑯ 同註⑮，頁一～三。

註⑰ Tan,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p. 13.

註⑱ 同註⑰，頁一三。

註⑲ 五年計畫的重點包括農業、重工業、勞工組訓、南越社會主義化、出口、教育和技術訓練，以及建立統一的經濟體等七項。詳見 Tan,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pp. 14-20.

註⑳ 同註⑲，頁一八～二〇。

越南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使得整個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經濟成長率從一九七六年的9%降至一九七八年的2%，而失業率也高達十三%。最糟糕的是糧食的生產，一九七六年越南計出產一千三百萬噸糧食，而一九七八年僅出產一千一百萬噸。②其他許多因素也造成經濟情況的惡化，越柬和中越邊境的緊張關係使得越南政府投資許多人力、資源在軍事上，相對的減少了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口。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則是由於共產化導致數以萬計的工商業者搭船逃離越南，這些「船民」中多數是華裔越南人，這對於越南經濟的惡化無異雪上加霜。③據卡巴斯頓 (Jean-Pierre Cabestan) 估計，越南的政策迫使一二十三萬華人和三萬越南人逃難至中國大陸；而出海的「船民」更超過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華人。④此對於中越共雙方關係之惡化有非常大的影響。

### 叁、一九七八年後面臨之困境

越南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揮軍入侵柬埔寨並把波布 (Pol Pot) 政府趕到西部邊境的卡達孟山區 (Cardamon Mountains) 打游擊。越南則扶持橫山林 (Heng Samrin) 成立傀儡政權。在寮國方面，自一九七五年西貢和金邊淪入共黨手中後，維持十餘年的中立政府宣告垮臺，而由親越南共產黨的寮國人民革命黨取得政權，至此一個以河內為首的「印度支那聯邦」已然成形。⑤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許多因素所造成的，第一是長久以來，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民間的不合。柬埔寨人在西元第九世紀至第十四世紀所建立的吳哥王朝 (Angkor civilization) 是他們最輝煌的時期，⑥在那時，南部越南是吳哥王朝的一部分。可

註① 同註⑨，頁一九。

註② 同註⑨，頁一九～二〇。

註③ Hervouet, Gerard, *The Return of Vietnam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ttawa, Ontario: Canad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1988), p. 33. 原出處則為 Jean-Pierre Cabestan, "La politique de la Chine populaire à l'égard des Chinois d'outre-mer" in P. de Beaugregard et al., *op. cit.*, p. 105.

註④ 有關寮國的演變，詳情請參閱 McCloud, Donald G., *System and Process in Southeast Asia*, pp. 229-231. 另按 David Aikman 的說法，越南內部的文件一直很明白的指出：河內認為它的「革命」和柬埔寨、寮國所發生的一切事務是不可分的。詳見 Aikman, David, *Pacific Rim*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p. 149.

註⑤ 有關柬埔寨的早期歷史，請參閱 SarDesai, D. R., *Southeast Asia: Past & Pres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Chapter 2, pp. 20-29.

是自從十五世紀吳哥王朝衰退以後，柬埔寨人就先後陷入泰國和越南的兩邊威脅和戰亂之中。到一八三四年，越南已實際上併吞柬埔寨，柬埔寨的反抗軍在泰國軍隊之支援下和越南軍隊激戰數年，導致柬埔寨王子安洞（Ang Duong）於一八五三年修書法皇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要求干涉和支援，法國遂於一八六三年正式成爲柬埔寨的保護國。這段長達千年的領土糾葛和民族衝突，成爲這二民族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恢復獨立以來彼此大小衝突不斷的歷史淵源。<sup>②</sup>

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南一直處於和法國以及美國的戰爭之中，惟越南共產黨仍然支持柬埔寨共黨的活動，進而牽涉到柬埔寨的內部爭鬪。到一九六〇年代，越共和東共爲了爭取對柬埔寨的領導權而翻臉，越共轉而支持施亞努親王（Prince Sihanouk）以對抗波布所領導的東共，越共軍隊和東共並於一九七一年發生戰爭。爾後，波布和他的同夥成功地把東共中親越共甚至以前和越共并肩抗法的老一代領導人逐出權力圈外，這些在巴黎受過教育的新一代東共領導人基於過去被越南佔領時的慘痛歷史經驗和主張雙方疆界須基於民族的界線（ethnic lines），而和越南發生多次領土上的衝突和大小戰鬪。這些衝突終於導致越南軍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入侵柬埔寨並成立傀儡政權。<sup>③</sup>

中共並沒有置身於越共和東共的失和之外。自從中蘇共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事件以來，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如何減低蘇聯和越南的合作關係。<sup>④</sup>當越戰結束後，中共最初嚐試各種經濟和外交政策以影響越蘇的關係，這些示好包括中越邊界爭執、西沙、南沙羣島的主權問題，以及在蘇越經援協定後馬上簽定中越經援協定等等。<sup>⑤</sup>

越南於一九七七年倒向蘇聯後，中共隨即對越南採取敵對的態度，並停止提供政經的支持；中共此時已不寄望越南仍然

註② 有關此二民族的歷史背景及衝突，請參閱註②，第十章，頁一一八～一二五。對柬埔寨人言，吳哥王朝時代的輝煌歷史是他們一直所引爲自豪的。吳哥

王朝除了遺留下極豐富的遺產外，政治制度也是極爲先進的。吳哥王朝有一個很成功的中央集權式官僚系統，它將帝國劃分成數十個省份並治理之，這在歷史學家的眼中是非常進步的。可惜的是吳哥文化的沒落原因一直是一個歷史上的謎。有關歷史學家對吳哥王朝政治制度的評述，參閱 Kulke, Hermann, "The Early and the Imperial Kingdom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Marr, David G., & Milner, A. C.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p. 1-22.

註③ 有關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近因，參閱 Beresford, Melanie, *Vietna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pp. 202-203.

註④ 越南一直是中共在對蘇聯戰略中極爲重要的籌碼。當中蘇共失和後，雙方均爭取越共的支持，等到越共倒向蘇聯後，中共轉而支持越共的鄰居柬埔寨以和越共對抗，其目的是擊破蘇聯在亞洲的圍堵中共政策，另一方面也保持中南半島上勢力平衡以免替自己在後院養個大敵人。有關中（共）蘇越三邊的關係，參閱 Ross S. Robert,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 2, 3 & 9.

註⑤ 參閱註②，頁三七～四〇。這些於一九七五年所做示好不發生預期的效用後，中共馬上停止經援，並重申對領土的主權（頁一二六）。

保持獨立於中蘇之外。華人在越南被迫害的問題，此時也首度被中共提出「嚴重警告」並可能加以報復。<sup>②</sup>當越南繼續和蘇聯促進關係後，中共立即加速支持柬共重新挑起越東邊界衝突。<sup>③</sup>這些行動一方面警戒越南，另一方面則試圖平衡中南半島的勢力。

越南一九七八年底入侵柬埔寨後，中共見各種行動均不奏效，即積極部署「自衛性反擊」(self-defensive counter-attack)。<sup>④</sup>在外交上，中共於十二月初，向美國表示對於建交的高度興趣，並於十二月十五日，宣佈雙方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五日訪美時並和卡特總統討論「教訓」越南之事。<sup>⑤</sup>另一方面，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協國家，並促成東協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聯合陣線。最後，鄧小平在說服共黨內一些領導人對於蘇聯報復的憂慮後，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進兵越南。<sup>⑥</sup>

越南雖然順利建立了實質上的「印度支那聯邦」，並讓中共在邊界戰爭中吃足苦頭，它在國內經濟上卻付出非常大的代價。由於戰爭的影響，國內資源大量移往軍事用途，導致國民生產和工業生產均大幅下降。工業生產成長率從一九七八年的五·四％降到一九七九年的負四·五％和一九八〇年的負九·六％；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也從一九七八年的二·二％降為一九七九年的負〇·五％和一九八〇年的負三·七％。<sup>⑦</sup>

越南經濟的困境表現在通貨膨脹和糧食配給的減少。在一九八一到八五年的五年計畫，通貨膨脹達到每年百分之百。而糧食配給則從每月的三十三磅縮減到二十五磅，一般的商品則長期處於嚴重匱乏的地步，這些都導致黎筭和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所召開的黨五次代表會上，承認越南面臨「許多嚴重問題，諸如缺乏每一樣東西——能源、食物、衣服、車輛、藥品、甚至紙。」<sup>⑧</sup>

註<sup>②</sup> 同註<sup>①</sup>，頁一三〇。

註<sup>③</sup> 同註<sup>②</sup>，頁一三五—一三八。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③</sup>，頁二一一—二二二。

註<sup>⑤</sup> 有關鄧小平訪美和卡特二度討論「教訓」越南之詳情，參閱 Chen, King C.,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pp. 91-92.

註<sup>⑥</sup> 有關中共在攻打越南前，在外交上的種種努力，詳情見 Ross, pp. 218-237.

註<sup>⑦</sup> 所用資料源於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port*, 22 June 1983, p. 6. 引自 Tan, Teng Lang, *Economic Debates in Vietnam*, p. 35. 同時期的農業生產則分別成長了0.1％、6.8％、和5.8％，唯因制度僵化以及運輸失調，造成了一九八〇年北部越南恩平省(Nghe Tinh)和海防市(Haiphong)的搶糧和農民暴動事件(頁三六)。

註<sup>⑧</sup> Chen, p. 144.

因越南侵略柬埔寨所導致外援的斷絕，使得經濟狀況更加惡化。除了美國在越戰後一直沒有提供經濟援助外，其他已開發國家如日本、英國、西德、以及世界銀行、聯合國糧食計畫(The U.N. Food Program)等機構相繼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後，宣佈凍結對越南的援助。<sup>②7</sup>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資料，越南的外債在一九八四年達到六十億美金的驚人數量。<sup>②8</sup>對一個每年外銷總額不到六億美金的國家言，越南因入侵柬埔寨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sup>②9</sup>

## 肆、越南在八十年代後期的改革

越南在滿足於「印度支那聯邦盟主」的地位時，沈重的軍費負擔和幾近崩潰的社會主義經濟，逼得越共領導人於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進行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在越南也不是第一次，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也曾做過一些改革，以試圖挽回因實施社會主義制度所造成的貧困和生產力的低落，諸如黨內負責經濟計畫的負責人武文杰(Vo Van Kiet)在胡志明市主導經改獲致頗好成效。<sup>③0</sup>唯在當時黨內的領袖仍然是被一些以意識形態掛帥的老人所控制，對改革不感興趣。越南共產黨一直等到總書記黎筍死亡後，才面對現實，展開一連串的經濟改革。

越南經濟改革的近因，是一九八五年九月份實施貨幣和工資改革的失敗。在那次貨幣和工資改革中，越南政府將舊貨幣一盾(Dong)收回，而以新的盾取代，新舊貨幣的兌換率是一：十；至於對美元的兌換比率則是大幅貶值，由原來的一：二盾換一美元貶成十五盾換一美元。<sup>③1</sup>這種將貨幣對內縮水對外貶值的方式，馬上造成民衆搶購已稀少的物品和通貨膨脹，到一九八六年春季時，黑市美元已跳昇至四五〇比一盾，而通貨膨脹則由一九八五年前的五〇%上昇到一九八六年春季的三五〇%，甚至到秋季的七〇〇%。<sup>③2</sup>

註<sup>②7</sup> *Ibid.*, p. 145.

註<sup>②8</sup> *Ibid.*, p. 145.

註<sup>②9</sup> Chin, Kin Wah, *Defense Spen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p. 287. 根據 Chin 的估計，越南每年花費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於國防上，這比率在世界各國中是最高的之一（比較日本的百分之一和美國的百分之一一六）。

註<sup>③0</sup>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FEER) 3 march 1988, p. 20.

註<sup>③1</sup> *Asia 1987 Yearbook* (1988), p. 265. 一位越南官員評估貨幣改革的影響時，表示：「五號颱風（當年一個造成很大損失的颱風）只侵襲北部越南，貨幣改革則將整個越南整跨了。」

註<sup>③2</sup> 同註<sup>③1</sup>，頁二六五。



日本學者 Tetsusaburo Kimura 在一九八八年九月舉行的有關越南現況的學術會議中，做了一次很詳細的評估，他將這些失敗的改革形容爲一九三〇年代蘇聯史達林模式的失敗；農民反抗強迫性的工作和存錢，導致農業生產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負成長。另一方面，工人則需要另找第二或第三份工作以維家用，而工業產品的價格也飛漲，因此，逼得河內將所有蘇聯的經援用來購買消費品，而不是去投資於生產事業上。Kimura 的結論是，越南仍將陷於低生產力、高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中，唯有大量的外援，才能使越南走出這種困境。<sup>④</sup>

在這種國窮民怨的情況下，越南共產黨內要求改革的呼聲也愈來愈大。正好越共總書記黎筭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去世，繼任者是於四〇到五〇年代曾任總書記的長征，使得較年輕一輩更加不滿。因此，同年十二月所舉行的共黨代表大會中，在改革派的壓力下，原有的老領導幹部，七十九歲的總統兼總書記長征，八十歲的總理范文同和七十六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黎德壽（Le Duc Tho）因「高齡和健康不佳」而退居幕後操縱。<sup>⑤</sup>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改革著稱的阮文靈（Nguyen Van Linh）和其他較年輕的改革派領袖們所組成的集體領導。

阮文靈生在北越，但成年後大部分時間在南越從事共黨活動，現年七十五歲。一九八一年在胡志明市當黨書記時，推行經濟自由化，使得當地的經濟狀況遠超過越南的其他地方，然而當時領導者的政策是消除私有經濟活動和財產，因此阮氏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頗不得志，一九八二年還被逐出政治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又回到政治局內。<sup>⑥</sup>他和當時在胡志明市一起搞經濟自由化的武文杰，都主張放棄採用配給卡和低價供應公家單位原料的制度，此一不合理的價格制度祇會造成投機行爲和物價上漲。另一方面，在企業制度上，他們也要求放棄國有企業的壟斷，允許小型私有企業的競爭，以使國有企業更有效率。<sup>⑦</sup>

### 改革派的力量

越南共產黨何以能夠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代表大會中，順利地將老一代——以意識形態掛帥的領導人逼下臺而實施改

註③ "Vietnam Today: Assessing the New Trends", in *Vietnam Commentary* (Singapore: Information & Resource Center, 1988),

Nov. 1988, pp. 12-13. Kimura 在結論中並強調自柬埔寨撤軍對經濟的重要性。

註④ *Asia 1988 Yearbook*, p. 252.

註⑤ 阮氏被逐出政治局的理由沒有官方說詞，唯波特指出阮氏被逐的時間正好是共黨內部強硬派出頭的日子，參閱 Porter, Gareth, "The Politics of 'Renovation' in Vietn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0, p. 76.

註⑥ 同註⑤，頁七六。

革呢？這是一個很值得許多研究越南問題學者們研究的題目。除了貨幣改革的失敗外，波特（Gareth Porter）提出的說法是，共黨內大多數的領導者在一九八〇年代下半年，已逐漸體會到世界，也已逐漸從以前的二個陣營論轉變成互賴論（Interdependence）。根據波特的說法，這種黨內有關世界觀改變之辯論，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九〇年為止，進行了六年。<sup>④</sup>在此以前，越南共產黨都一直堅信這個世界處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生死鬥爭中，可是自從戈巴契夫上臺提出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的口號，並試圖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爭時，越共內一些較年輕（不屬於胡志明那一輩）的領導人開始考慮和辯論越南在整個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年輕的一代逐漸接受互賴論並試圖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找出生存和發展的位置。波特的結論是，目前共黨內雖然接受互賴論的改革者多於二個陣營論的保守者，惟雙方仍在進行持續的辯論，並且可以共存。<sup>⑤</sup>這種說法是典型的「黨內鬭爭論」。

另一方面，一名在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越南學者 Kim Ninh 則認為，有關越共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代表大會改革派奪權後才進行改革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他認為一九八六年的政權替換及施行改革是越共內部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即共同策劃的。他以阮文靈的重回政治局以及黨內三巨頭的退位等情況，來證明那些改革是有計畫和自發性的。此外，他認為保守派杜梅（Do Muoi）擔任總理，也是那些老一輩領導人為謀求政治局內改革派和保守派平衡的方式之一。<sup>⑥</sup>Kim 對於經濟及領導階層改革的「計畫論」和波特的「鬭爭論」是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筆者對此則較傾向於「計畫論」。理由有數端：首先，阮文靈是越南共產黨員中，第一位被逐出又被拉回政治局的領導者，而在逐出的三年中，政治局的掌權者都是同一批以黎筍、黎德壽為首的老一代領導者，而在黨政的重要職位及政治局的成員上也都沒變動，此一形勢說明了並非是改革派打垮保守派。如果依照波特的說法，阮文靈的再被拉回政治局應該伴隨著領導階層的大變動，而這並沒有發生在一九八五年的政治局中，顯示老一輩的領導人在當時仍握大權。筆者對於阮文靈「進入」政治局的解釋是，於七〇年代末期，當越南大力邁向共產主義時，他在胡志明市搞經改，因而被保守派人士踢出政治局，等到八〇年代初期，越南政經均陷困境時，乃將阮氏重拉回以實施改革。

其次，黎德壽在越南共黨內，仍然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老」級人物。「遠東經濟評論」的資深記者 Nayan Chanda 在

註④ 有關越南共產黨內對於意識形態修正的變化，參閱Porter, Gare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etnam's World View: From Two Camps to Interdepende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June 1990, pp. 1-19.

註⑤ 越南共黨內保守的勢力仍然很大，從阮文靈提名保守派的杜梅（Do Muoi）為總理，即可看出雙方妥協共存的情形。

註⑥ 有關 Kim 的主張，參閱 Kim, Ninh, "In the Era of Renovation: Leadership and Security in Vietna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ept. 1989, pp. 213-235.

一九八九年十月甚至報導「雖然退休，黎氏仍然是黨內最有權力的人」，<sup>⑤</sup>如果不是有計畫的黨內領導人新陳代謝，黎氏不可能維持他的影響力。

二件發生在近二年的事件可以說明這些「大老」的影響力。第一件是一九八八年前總理范雄(Pham Hung)死後，阮文靈沒有提名武文杰，而提名保守派的杜梅為總理候選人，杜梅是和黎德壽有密切關係的人。<sup>⑥</sup>另一方面，黨內傾向改革的黨員則推出武文杰為候選人，並要求允許二人競選，最後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在四百九十六位代表的投票中，以百分之六十四的比率選出杜梅為總理，這和以前百分之百的比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次選舉表示了保守勢力在「大老」們的影響下，仍然十分龐大。<sup>⑦</sup>

另一事件則是傅旋巴(Tran Xuan Bach)的被逐出政治局。傅氏今年六十五歲，北越人，在一九七六年時，曾因娶一名小他近三十歲的女子而被逐出共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八二年時，又回到中委會，一九八六年，隨阮文靈而被拉進政治局，和阮文靈、黎德壽都有密切的從屬關係。自從進入政治局後，傅氏受到東歐自由化運動的影響，積極鼓吹政治改革，因而聲名大噪，儼然成為改革派的大將，東歐的外交觀察家相信傅氏極有可能接替阮文靈成為下一任總書記。<sup>⑧</sup>然而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的共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傅氏以「違反組織和紀律上的原則，以致造成惡劣的影響」之理由被逐出政治局。<sup>⑨</sup>由此可看出保守派的勢力和其以穩健審慎來進行改革的態度。

### 改革派的改革

阮文靈的改革理念是十分前進的，然而在沒有足夠力量的支持時，常常陷入心餘力絀的困境。自上臺後，阮文靈即高舉「再創新」(doi moi)的運動口號，從事各種改革。在農業方面，他提供各種誘因來提高農產品的生產力，這包括修改土地法以保證農民對所耕之土地有十年的耕種約期，農民可得到所耕農產品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這和以前只得到百分之二

註⑤ *FEER*, Oct. 5, 1989, p. 24. 絕大部分的美國記者和學者，都以「鬭爭論」的眼光來看越南共黨內部情勢的發展，而這很容易誤導我們觀察越南情勢的演變。

註⑥ 東歐國家駐河內的外交家指出，杜梅是黎德壽的親密好友，參閱 *Asia 1989 Yearbook*, p. 249.

註⑦ 有關此次選舉的含意及黨內發展，請參閱 Cima, Ronald J., "Vietnam in 1988, The Brink of Renewal," *Asian Surv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n. 1989, pp. 64-67.

註⑧ 有關傅氏的報導，參閱 *FEER*, Feb. 1, 1990, pp. 24-25; Apr. 12, 1990, pp. 12-13.

註⑨ *FEER*, Apr. 12, 1990, p. 13.

十五的收穫量而言，是很大的改進。<sup>⑤</sup>改革派自從於一九八八年實施該政策後，績效卓著。越南在一九八七和八八年都進口大量米，到了一九八九年，已由進口改爲出口，數額爲一百五十萬噸。<sup>⑥</sup>

在經濟方面，改革派取消河內地區不許有私人生產企業的限制，介紹私有企業的概念以及給予南越地區更大的經濟自主權。此外，並經由限制政府支出和國家補助以穩定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爲吸引外資，還修訂外國投資法，提供各種稅捐上的減免和保證不沒收或國有化合資之企業。因此，通貨膨脹率降低到一九八九年的三四%，遠勝於一九八八年的一七〇%。<sup>⑦</sup>改革派在經濟改革方面的阻力較小，然在政治改革上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傳旋巴的被罷黜主因就是因爲他提倡經濟改革一定要隨著政治改革才能成功，這引發保守勢力的恐懼而奪掉傳氏的政治地位。改革派的另一個動作是要把軍隊的數量從一百二十餘萬人裁到六十萬人，這更引發軍方保守勢力的干涉而不了了之。<sup>⑧</sup>雖然如此，政治方面的改革仍然持續而緩慢的進行。最顯著的例子是國民議會的自主性日益增加：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次會議中，議長宣佈今後黨對國民議會的領導權只能夠經由說服而不是以前的完全控制。一九八八年選舉杜梅爲總理的情形即爲最好例子。到一九八九年，所有委員會及大會的開會都透過電視實況轉播，一些熱門的議題，譬如私人報紙是否需要以保障新聞自由等，均呈現在越南人的眼前。<sup>⑨</sup>可是在最重要的選舉議員上，越南還是實施「推薦」候選人制，以免遭到失去國民議會控制權。可見在有關政治改革的途徑上，仍然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sup>⑩</sup>

## 伍、越南未來改革的方向與成敗

如前所述，越南的改革是保守勢力受到經濟困境、黨內改革呼聲、以及國外情勢急速變遷等因素而逐步實施的，這種情勢類似中共的經濟改革，而非蘇聯戈巴契夫式的政經改革。越南共產黨還是牢牢掌握住改革的步調和方向，是以期望越南能完全走向戈巴契夫式的改革，在現階段是不太切實際的。

註⑤ Cima, Ronald J., "Vietnam in 1988: The Brink of Renewal", *Asian Survey*, Jan. 1989, p. 66.

註⑥ Porter, Gareth, "The Politics of 'Renovation' in Vietn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0, p. 80.

註⑦ *Ibid.*, p. 80.

註⑧ Cima, Ronald J., "Vietnam's Economic Reform: Approaching the 1990s," *Asian Survey*, Aug. 1989, pp. 788-789.

註⑨ Porter, Gareth, *op. cit.*, pp. 81-82.

註⑩ *Ibid.*, p. 82.

越南、中共的改革和蘇聯的改革最大的差異，是前二者的開國元老們仍然在幕後遙控政治的運作，如中共的鄧小平、陳雲、楊尚昆等，這些「大老」們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已根深柢固的深植心中，叫他們真正實施民主化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這也是為什麼北韓的改革幾乎是尙未開始，因為金日成——如同越南的胡志明、中共的毛澤東——還是被老百姓膜拜著，怎麼可能叫一個治理國家已四十餘年的領袖走改革的路線？因此，要實現真正的民主化運動，至少要鄧小平、陳雲這些「大老」們死去後，才有可能。

波特在他「越南改革」的文章中結論說：

「短時期內，越共領導者是牢守著一黨控制，並且儘量抗拒多黨政治的壓力。然而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各種力量——包括蘇聯政治制度的日漸開放、外國資本進入越南的影響、逐漸多元化社會的發展，和意識形態上一個多元的共產黨理念——的累積將沖擊著越南走向真正的政治競爭。」<sup>⑥</sup>

越南的「大老」黎德壽已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去世，我們可以預期越共保守派的勢力將大受影響，而將於一九九一年所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中，年輕一代的改革派將會獲得更大的權力，來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改革。

至於就長期而言，越南共產黨會不會冒著失去掌握政權的危險，來從事戈巴契夫式的改革？席馬（Cima）對此抱著樂觀的態度，他認為越南共黨會冒著政治上的危險而盡力去達成必要的經濟目標。<sup>⑦</sup>筆者則認為這不是越共領導人主觀意識上所能控制的，整個外在世界的政經環境會逼使九十年代的越南往世界經濟體系靠攏以圖生存，因此，屆時越南也終將面臨類似戈巴契夫式改革的壓力。

註⑥ *Ibid.*, p. 88.

註⑦ Cima, Ronald J., "Vietnam's Economic Reform: Approaching the 1990s," *Asian Survey*, Aug. 1989, p. 799.

\*

\*

\*